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九期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012c)

---

【人物春秋】	不识时务亦俊杰	迟泽厚
【书刊文摘】	秋思录：“他妈的！跑什么跑？！……”	黄 正
【国史论衡】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	何 蜀
【史林一页】	陆平为什么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	钱 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人物春秋】

### 不识时务亦俊杰

• 迟泽厚 •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未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

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8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其中内幕。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問題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作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也是太无能了吗？

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 ◇ 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乾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1951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

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

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48军（后又改称21兵团、55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同志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同志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参加平叛。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同志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同志是团级干部，他很看重这个职务，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是一个团的党委核心，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同志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同志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 ◇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乾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义。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乾同志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

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他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作出决定性贡献。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黄永胜重视人才。过去战争年代，谁有本事谁出头，谁也没话说。和平时期，特别是19

55年授衔之后，论资排辈逐渐成风，不少资历浅的人才受到压抑。黄永胜对这种新出现的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腐败现象很反感，并有不少抵制行动。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俗称一处，是司令部的核心部门，黄永胜用了一位“三八式”的上校当处长，却让一位红军时期的大校当副处长。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司令员孙干卿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大校，而一位早期的红军少将却当了他的副手。这种用人不拘一格的做法全军罕见。有人说：“也就是黄司令敢这么干！”黄永胜曾参加过北伐军，以后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也算是个“老资格”。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自傲的资本，嫉贤妒能。与黄永胜同属中央红军的刘亚楼和杨成武，入伍时间都比他晚，年龄也比他小，但是两人的职位很快便赶上了他，刘亚楼还多次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对两人都很敬重，彼此交谊很深，这也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吧。但是，被黄永胜看“扁”了的人，要想改变他的印象就难了。

我不知道黄永胜如何评价我的工作。我三次离开他那里时，他都没讲，自然我也不问。但据我看，他对我未必十分满意。就我感觉到的，我入伍后虽也经过一些磨练，但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习气，常常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反映在工作上，我认为不属我职责之内的事，就一概不干。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机关的舞风甚盛，广东省交际处的周末舞会尤为有名。黄永胜极爱跳舞，但我对这项活动却有一些负面看法，因而我从不主动为他打听和报告舞会消息，他不会没有感觉。但总体上讲，他对我还是体谅大度的。秘书工作经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可能不出纰漏，黄永胜又是个急性子人，但遇到这种情况，他也只是指出问题，从未有过疾言厉色的批评责难。黄永胜常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鼓不用重槌敲。我自然也不甘当破鼓。

#### ◇ “文革”考验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

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恩来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恩来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他能如此表态，实属不易，倘若没有事先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周恩来的新指示也让黄永胜增强了团结两派群众，减少社会动乱，创造“支左”新经验的信心。从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作他的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

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所未见。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〇事件”中，共死伤18.4万人。见该书第三卷298页。——笔者）！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8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〇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于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〇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曾多次表彰。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

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七八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紫阳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

#### ◇ 不识时务亦俊杰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单位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由于毛泽东、林彪很少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常常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也极为恶劣，黄永胜等人人为之忿忿不平。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离开江青处之后，四人认为这是严重的非组织活动，立即报告了林彪，又在林彪的支持下，由黄永胜、吴法宪向



毛泽东作了报告。却不料，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暧昧，黄永胜深感失望。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面临着个人命运前途的重大抉择。但是，黄永胜认为自己一颗赤心干革命，上无愧于党，下不忤于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并不存在什么站错队的问题，他不愿意干违心事儿。他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产党应当是讲民主的，可为什么在党内却会出现反民主的霸气而且逐渐坐大？就是因为许多人放弃原则、姑息纵容。倘若错误的东西刚一露头，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对，它或可知难而退，反之，则你让一寸，它进一尺。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倘若人们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 ◇ 不尽的困惑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以及他的亲密伙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先是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投入牢狱。这原在意料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他们积怨极深，岂能饶过他们！

5年之后，失去了后台的“四人帮”倒台。毛泽东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当然是敌人，而打倒“四人帮”者又声称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照此逻辑，人们曾期望原来主要由“四人帮”掌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有可能重新予以审议。却不料，后来者不但对“人犯”照单全收，而且管控更加严苛；同时对“四人帮”加给他们的诸多罪名也一概继承；特别是居然能把两个明争暗斗多年、水火不相容的政治集团捏到一起，把他们说成是“一伙的”，然后一锅煮，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根据中共中央（且不管它后面是谁在掌权）在“九一三”之后公布的材料，林彪可谓阴险毒辣、罪行累累，而其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阴谋失败后，又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黄永胜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自然会参加这些阴谋活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的黄永胜五大罪状中，竟无一条与林彪的上述罪行有关！人们不能不怀疑，黄永胜到底有没有资格担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把手？他倒是侯宝林相声段子中那个外行跑龙套的。

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最重要的罪证，是他的一个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一张便条。手令可以理解为写给林彪集团各主要成员的，黄永胜自然有份儿，而便条则是专门写给黄永胜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两份至关紧要的材料，黄永胜在“九一三”之前竟然没有看到！手握军权的黄永胜在武装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人挖苦林立果搞政变像小孩子过家家，看来林彪在这方面也不比他儿子高明。

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自然要有一批文臣武将，黄、吴、李、邱等人是少不了的。但是，这四个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特别法庭也不得不确认这四人确不知情。这着实令人尴尬。难道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这一家三口再加上周宇驰、王飞等几个无名之辈，就可以另立一个中央吗？

在黄永胜的五大罪状中，第一条就是他“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消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彭德怀元帅对中国革命功高盖世，无论谁迫害这位革命元勋，都该严加惩处。但是，看了对黄永胜的这些指控，人们马上会产生许多疑问：上述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是由“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专案组是自行作主还是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提出这些意见来的呢？专案组的意见不会只送黄永胜一人，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也同意专案组意见的或者反对专案组意见的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件公案：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专案组提出：“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建议“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在表决时，除一位女中央委员装病没有举手外，到会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功名显赫的革命元勋、政治家，都一致举手通过，这与黄永胜的罪行又有什么区别，是否也应予以追究呢？又如，一位以告密为能事的上将军，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革命元勋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

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国民党伪造的诬蔑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直至周逝世前3个多月最后一次进手术室前，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他就此事的辩诬材料，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悲愤填膺！然而，这位上将军却一直大红大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黄永胜的其他几条罪状，也都存在着类似的一些“看不懂”的遗憾。

1981年，我在军事学院（即后来的国防大学）学习。我所在队的队长姓王，他与学员们的资历都差不多，课余时间大家经常一起闲聊。这位队长曾作为军事学院的代表旁听了“两案”审判。一次，他谈起了旁听印象。讲到黄永胜，他说：“黄永胜不要律师为他辩护，他自己讲了足有3个钟头。你别看这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儿讲得还挺有道道咧！”他当时讲话的表情和口气，不像把黄永胜当成反革命分子。“两案”审判时，电视台只转播了经过精选的部分画面，被告人自我辩护或律师辩护的情况都没转播。当时的报纸，在报道黄永胜的受审情况时，只讲到 he 最后念了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痍病，不曾涓埃答人民。如果不了解、不联系他前面的长篇发言，只能解释为他在参加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之后，现在痛悔、惭愧、认罪。但是，也有些颇有来历的材料说，黄永胜在被捕后，顽固，狡猾，拒不认罪。窃以为，“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近40年，“两案”审判已过去30年，黄永胜去世也已27年有余，他的自我辩护词似可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如果他讲得确有道理，或讲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真象，正可以史为鉴；即使他确属狡辩，那也不怕，可以当“反面教材”教育群众，毛泽东讲过，毒草锄掉可以作肥料嘛！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网上有黄永胜的一些材料，看不看？我问是哪一方面的？答曰生活作风方面的。我说，这类材料，过去我看过一些，现在不想看了。

“为什么呢？”朋友很认真地问。

我说：“很简单，第一，这些材料很多都是添油加醋甚至捕风捉影的东西，哗众取宠，很没意思；第二，黄永胜并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倒的，回避 he 该不该打倒的根本问题，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岂不是舍本逐末、顾左右而言他？第三，黄永胜在生活作风方面确有人所诟病处，但是，有些掌管 he 生死簿的人，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他多得多，严重得多！我不反对甚至拥护将生活作风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项标准，但应该一视同仁，要查就从上到下认真查起，不能双重标准，为尊者讳；不应把倒台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当落水狗打，揭老底儿，而把得势者个个打扮成头罩光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再讲要跑题了，打住。

2010年9月23日于广州

□ 本文为《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附录四

~~~~~

【书刊文摘】

秋思录：“他妈的！跑什么跑？！……”

• 黄 正 •

正是1971年的那个秋天，黄永胜正在走向自己61周岁生日，共和国即将迎来第22个生日。这两个生日都还没到，却来了个惊天动地的“913”事件。他以在战争中曾无数次面临生死一线和胜负一瞬，所锻炼出来的直觉，意识到自己决无侥幸。

这一天，那个恐怖的9月13日已过去了将近一周，邱会作带着大儿子邱路光到黄永胜的住处，来看望自己的老搭档、老战友。

到今天，快四十年过去了，邱路光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景：

黄永胜正坐在办公桌前批示文件。邱路光看过去，只看见坐在窗边的黄伯伯的背影，他的肩膀和手微微颤抖着，一边批着字一边说：“胖子（邱路光小名），你黄伯伯我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啊！”

黄伯伯没有抬头。因为邱路光逆着光，在他眼中，从窗外扑进房里的光线，将黄伯伯搅在一团不明不白的光网中，他只觉得黄伯伯那个背影——孤单无助，苍老悲凉……他的眼一热，就要洒下泪来……

黄永胜让邱路光出去办个事，他要与邱会作说些什么……等邱路光再回到这个房间时，只见黄永胜站在办公室中占据了整面墙的那幅巨大的“三北”防御态势地图前，久久地沉默着，眼睛瞪着地图上不知哪一个点，就那么瞪着……瞪着……邱会作坐在一把椅子上，盯着黄永胜也不说话，就那么盯着……盯着……

在死一样的寂静中，黄永胜突然用出全身力气，扯肝裂肺地吼叫了一声：

“他妈的！跑什么跑？！……”

叫声停下许久，余音还“嗡嗡”地在房间内冲撞、回荡……

这是一声嘶叫，沙哑，粗厉，尖锐，无奈，绝望，凄惨，不解，悲愤，发狂……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意味，就像是从灵魂的底里爆出来的，将几十截征战杀伐的岁月集中在声带上，再用军人的全部生命力集中在肺叶中，才能有那样一种吼。这一声吼，发自黄永胜整个的一生！

这是一句拷问，拷问着那个被极度尊敬的直接上级，为什么要把自己这一批一心想干好工作的老部下，丢入一个死局？

这是一句质问，质问在党内、军内可以选百个、千个办法，处理面临的一切，为什么要用“跑”这种选择，将这么一大批军队的精华，葬送在内部斗争之中？

这是一句疑问，疑问那个不明不白的夜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过程，导致出这一种结果？

这也是一句自问，自问着他自己作为一名军人，除了履行职责到最后一刻外，他还能做些什么，诉说什么？

……吼完了，黄永胜转过身来，面对着邱会作，相互对视，凝重地直视对方的眼眸……

接着，几乎同时，两位老军人一起嚎啕大哭。哇哇的，嗷嗷的，大张着嘴，涕泪横流，浑身抖动……只哭得房摇地动，天云变色！

哭完了，两人握了握手，什么也不说了，告别……

哭完了，两人眼泪抹干，照样干自己的工作，出席会议，出席外事活动……

他从来就不曾把毛泽东与林彪分开来看过。现在，他心目中的这个整体突然爆开了，还跑掉了一半，他根本就不能相信！

几天后，周恩来一个电话要黄、吴、李、邱四位老军人到大会堂开会。这一去，黄永胜就走上了他的前三任曾走过的那条路……不同的是，前面三任在那条路上可以峰回路转，他和他军委办事组的三位老战友，至今也没有找寻到一个出口……

□ 摘自《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尾章“北京青岛篇·滚滚长江东逝水”)

~~~~~

## 【国史论衡】

###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

• 何 蜀 •

面对这样一部由两个外国学者写成的全面、严肃而又生动、通俗的文革史，作为一个亲历过文革并致力于文革研究的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惭愧。

因研究方法、思维习惯、观察角度、表述方式等等的不同，以及拥有史料的丰富（有许多是我们很难看到的），尽管书中讲述的文革历史事件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读起来仍会感到十分新鲜，引人入胜，而且能给人许多新的启发。

此书的优点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谈几点在阅读中想到的意见，供作者参考。

#### ◇ 群众造反运动

现在不论国内还是海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是前三年，即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到1969年中共“九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文革，又主要是从1966年秋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8年秋各地群众造反组织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群众造反运动从兴起到终结的两年左右时间。这个观点，笔者始终认为如同把法国大革命只限定于雅各宾专政时期一样，是不对的。现在的一些所谓“毛左派”和一些底层民众提出或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实际上也只是想再来一次那样的群众造反运动（他们当然不是想再来一次“清理阶级队伍”或“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那样的运动）。

这种把文革只等同于群众造反运动的认识固然不对，不过，群众造反运动，确实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最富特色、最“史无前例”的一段历史。因此，这一段时期里的群众造反运动也最值得好好研究。但是多年来的文革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各界受难者遭到的打击迫害，一是波诡云谲的高层权力斗争。一说到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则往往只想到红卫兵（而且往往是把初期的“老红卫兵”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很少关注到

当时遍及各行业各领域各阶层的群众造反组织及其活动。

不知是出于了解情况和掌握资料的不足，还是对群众造反运动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独特性的认识不足，本书涉及群众造反运动的篇幅显然不够，只在第八章“天下大乱”中的“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两节里，第九章“上海‘一月风暴’”的“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上海工人造反”、“上海的‘一月风暴’”三节里，第十章“夺权”的“第一批革命委员会”一节里，及第十二章“武汉事件”、第十三章“五一六阴谋”、第十四章“红卫兵的消亡”中的一些内容里零星涉及到——从“红卫兵的消亡”这个标题也可看出，作者只注意到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消亡，而没有注意到当时拥有人员更多、在一些地方起到了更为重要作用的工人、机关干部、农民、市民甚至军队领导机关（如军委各总部机关、各军兵种机关、各大军区机关等）的官兵中的各色群众造反组织的消亡，及他们在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困兽犹斗。与此相关，对1967年2、3月间全国许多地区镇压造反派的“镇反”运动及4月开始纠正这一运动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书中几乎未提，只是在第十二章“武汉事件”中的“华中告急”一节里提到了武汉地区打击造反派的“镇反”。此外，还可作一对比：“清理阶级队伍”用了专门一章（第十五章），而主要打击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却只在“五一六阴谋”一章中的“保护周恩来”、“外地的清查运动”几节里用了很少的篇幅提及。相应的，在“批林批孔”一节（第二十一章）里，也只字未提各地普遍涌现的少数前造反派成员的“反潮流”活动（有的是为了争夺在“新生红色政权”中的地位，有的是为了争取给此前在“清队”、“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遭到的打击迫害平反），这一波“反潮流”相当于一次变相的、规模缩小的“造反运动”，而且在不少地方延续到了1975年，直接成为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的起因——在第二十二章“邓小平主政”中提到了“闹派性”，“打派仗”，但若前面缺少对群众造反组织派别冲突的叙述，不了解历史的读者很难懂得“派性”、“派仗”是什么意思。

#### ◇ “一打三反”运动

第十七章“胜利者的大会”最后一节是“‘一打三反’运动”。虽然只有一节，但却已经比中国大陆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更加重视了文革中这一空前恐怖的、由官方公开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运动。相比之下，国内文革史家的专著还很少这样为“一打三反”花费专门一节的笔墨，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只在讲到“斗批改”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小节里附带提到“一打三反”（《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336—337页），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则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的文革部分也没有“一打三反”辞条，只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辞条中简略提及。

本书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作者对“一打三反”运动持续时限的认定也远比中国大陆文革史著述中的记载更为清晰准确。如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中提到“一打三反”运动时说：“从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48万多名”（《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330页，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也说“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则称“一打三反”运动中“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千多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32页）他们都把“一打三反”运动的时限划在1970年2月到11月之间，而本书则依据史料判定：“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30

9 页)这是本书值得赞赏之处。

不过,作者对“一打三反”这一运动的真实了解可能不够(或是为一些不可靠的史料所迷惑),在论述中显得出人意外的偏颇。本来,“一打三反”运动的核心是“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实际上就是镇压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中又主要是对毛泽东和文革不满的“言论犯”、“思想犯”,如北京的著名思想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公开为刘少奇、彭真鸣冤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解说员马正秀,公开书写反对文革的小标语到处散发的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王佩英;上海监狱中已关押多年的著名思想者林昭,因组织沪剧清唱而被诬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上海钢管厂司磅员、业余文艺爱好者谭元泉;江西省私下写作批判文革文章的南昌第一中学学生吴晓飞,大量著文全面批判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江西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员陈耀庭与谢聚璋夫妇;福建省上书毛泽东为刘少奇辩护和反对文革的福清县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公安特派员陈寿图;江苏省多次上书毛泽东要求结束文革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湖南省散发传单批判“三忠于”活动、批判文革的女知青丁祖晓、李启顺;甘肃省狱中关押多年的“《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要犯张春元(兰州大学学生“右派”)和杜映华(前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陕西省因对1957年至文革中一些方针政策不满而作过议论的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在家中保留了一些所谓“黑画”的西安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重庆市为刘少奇鸣冤的建设银行干部方运孚,散发传单公开否定文革及反右派、反胡风等政治运动并声讨“凌驾于党政军之上的阴谋家”的街道临时工、“摘帽右派”刘家瑞……这些“言论犯”、“思想犯”大多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并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示众后立即处决(个别在缓期执行中折磨致死)。当然,从人数上看,被处决的“言论犯”、“思想犯”只占“一打三反”中被处决者中很小的比例,但是,其他普通刑事犯所获的罪名(其中也有许多是夸大的甚至强加的)诸如贪污、偷盗、杀人、强奸之类是人们从来都知道不应做的,而“言论犯”、“思想犯”获罪的原因却是发表或流露不同政见、“关心国家大事”、“研读马列著作”甚至只是私下发发牢骚之类,人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些是“犯罪”,而在“一打三反”中却成了“犯罪”而且是重罪,这就必然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恐慌。

“一打三反”运动中还有两个十分突出的、有别于文革中其他整人运动的特点:一是中央将“杀人权”(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这一极为重要之点也被本书作者忽略);二是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判决书都交“群众讨论定案”。当时全国笼罩于空前的“红色恐怖”之中。生活在重庆市的笔者就一直保留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一打三反”高潮中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夜晚10点正,警备区的宣传车就驶上街头,在市中心马路上呼啸而过,男女播音员杀气腾腾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放大后在城市上空久久回荡:“最高指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戒严令……”然后是全城戒严,然后是在人们都已入睡之后的半夜里开始到一些人家“砰砰砰”敲门“查户口”……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还利用“一打三反”对前造反派人员进行了打击。吴德在回忆录中就说:“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77页)在“一打三反”中遭到了打击的前工人造反派成员陈益南则更是以亲身体会总结道:“(一打三反)在各地悄悄地演变成‘打击造反派中的坏人’,甚至实际延伸为‘打击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但,什么是‘造反派中的坏人’呢?在进行中,也就实际成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即一切与文革前的标准不符的行为。什么武斗与打人啦,蓄谋造党委的反啦、夺权啦,无政府主义啦,还有就是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可疑行为啦,等等。”“实际上,正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完成了将造反派成员几乎全部从革委会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员补台入内的权力机构的组织人事变动。”“全国大部分省份,由掌权的军方领导人与原来的地方老领导干部联手,大都成功地将‘一打三反’变为了一次清理造反派的运动。因而,除上海外,各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便纷纷被从‘新

生的红色政权’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撵了出来，有的甚至还被送进了监狱。”（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385、387、392页）

然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却在这一节里出现了对“一打三反”运动总体认识上的失误。书中除了提到宁夏银川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一“思想犯”冤案外，强调的是打击其他罪犯，“在上海市闸北区，运动中只有6%的案子是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许多‘群众宣判大会’的记录显示，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包括大量的普通罪犯。从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运动的理解来看，‘一打三反’的吸引力在于，确切地说，它给了人们希望。让某种曾经熟悉的‘法律与秩序’能得到重建，更有可能让‘好人’有机会镇住‘坏人’。”为了证明这一分析的可靠，作者还引用了一则当时北京市民在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讨论会上拥护“一打三反”的发言（306—307页）。作者没有想到，在那样的“红色恐怖”氛围中，街道居民有谁敢说出真心话？谁敢不表示拥护？当时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都把判决书发给群众讨论，而群众的表态几乎全是赞同“杀”！至于所谓“重建法律与秩序”则更是无稽之谈，当时全国都已按毛泽东的指示“砸烂公检法”，不再有什么依法审判，刑讯逼供成为常态（“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没有辩护，没有上诉，全是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北京则是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连检察院都已完全不存在）的军代表作出判决，交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主要是军人和刚“解放”出来不久、唯恐被人怀疑“对毛主席不忠”的干部）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有何法制意义，可想而知。

作者本来在这一节里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各地以“地下”罪名打击各种民间社交活动、窒息社会生活的情况：“……任何松散的组织活动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于是乎，出现了‘地下图书馆’，‘地下音乐会’，‘地下工作室’和‘地下婚姻介绍所’。任何牵涉到一、两个人以上的事情都是‘帮’。上海的实际例子包括‘推翻新政权帮’、‘赌徒帮’、‘流氓阿飞帮’等等。”（307页）可是，作者却不恰当地引用了一则南京“青年歌唱队”成员悔过书中交待如何搞流氓活动和谈论下流话的内容。这样叙述的结果，显然只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一打三反”运动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尽管作者的这些叙述都有原始资料作为依据，但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明白，作者被一些表面文章，被一些不可靠的材料迷惑了，未能分析那些引用的资料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思想，是否能说明事情的本质。

作者在这一节里写了几句显得像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一打三反’的对象几乎都是或者大部分必然是带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或者是在政治上敢于直言的干部。”（306页）这样的辩解大可不必，因为并没有谁作了这样绝对的“假定”。但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一打三反”镇压的对象虽然并不“几乎都是”甚至大多数不是那些“言论犯”、“思想犯”，但这一运动以其他刑事罪名镇压的人员中也有许多是冤案。

#### ◇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第十九章《林彪的叛逃和死亡》中的“庐山风云”一节里，针对庐山会议上“抨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本身”这一说法，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见解：“但是到了1970年，林彪、陈伯达或者林彪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们没有理由如此反对文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主要受益者。”作者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70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335页）

这一说法与官方有关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说法比较一致。但是这样认定“文革受益者没有理由反对文革”毕竟太机械，太简单化了。如果按照这样的“受益者”逻辑，就无法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变故，如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是由旧体制受益者的贵族



率先发动，否定斯大林的决定为什么是由斯大林时期的受益者赫鲁晓夫及其同僚们一致作出，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为什么是由文革的受益者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决定……历史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受益者不等于就必然是使其受益的体制（或路线、政策、规章制度等等）的拥护者、捍卫者。

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没有被打倒的军队领导人尽管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拥有了以往没有的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对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始终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加上文革以来从罗瑞卿到贺龙、萧华、刘志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队干部一批批遭到无妄之灾，“座上宾”转眼即可变成“阶下囚”造成的恐怖气氛，都使这些“受益者”人人自危，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设法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把庐山上的那场斗争仅仅看成是“争宠”，未免把严峻的政治问题庸俗化了，而且，这也无法解释毛泽东怎么可能把一场“争宠”看得那么严重，提到了“政变”的高度。

#### ◇ 另一些鸡毛蒜皮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如：

“1967年5月，文化部被撤销，其权力移交给了由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文艺组。”（161页）

此说不确。文化部在中央文革文艺组成立时并未宣布撤销，只是作为要用“毛泽东思想”实行“砸烂”的单位而存在（当时有所谓“砸三旧”的提法，即“砸烂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中央文革文艺组成立后也从未说过接管文化部的权力，只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做一些文艺方面的督导工作（而且存活时间极短，其成员很快就陆续被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在目前所见到的相关文字中也未见明确宣布撤销文化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53页）。1970年6月22日，中央批发国务院6月7日上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5页）。直到这时，文化部才正式由文化组取代了，但也不是撤销而只是改名。

（1966年底上海“康平路事件”之后，1967年）“1月1日凌晨1点，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下令，上海工人武装组织所属成员必须在3天内暂时上交所有的轻武器、步枪、手榴弹、轻机枪和重机枪、轻型火炮和弹药……”（165页）

注释说明此段内容引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识金著《将军卷进漩涡》一书。这本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到底是文艺作品还是历史著作且不管它，只就这段文字的内容看，就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众所周知，在1966年底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时，上海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中双方都还只是动拳头，当时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派别冲突都还没有达到动用枪支的地步，根本没有什么“工人武装组织”，不存在需要上交武器问题。如果上海竟然在1966年底就已经有了“工人武装组织”并且拥有了轻、重机枪甚至火炮，那可真是远远走在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前面了，因为全国各地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升级到动用枪支，普遍是在1967年夏秋之间的7、8月。因此，当时上海警备区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是不可想象的。

（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当他们在北京忙于国家事务时，主要由王洪文代理他们的工作。”（171页）

当时在上海代理张、姚实际主持市革委会工作的是徐景贤，因此被上海人称为“徐老三”。

（武汉的“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他们最终联合成立了‘武汉三钢’。”（203页）

武汉的“三钢”并非什么联合成立的组织，只是因为“二司”、“工总”、“九一三”这三个组织在1967年2、3月“镇反”中被军区镇压时的顽强表现被人们誉为“钢”，美称为“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者并称“三钢”。

（重庆武斗）“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码头在一次战斗中被夷为平地”。（220页）

重庆的朝天门是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而不是只在“嘉陵江边上”，它是两江环抱的半岛形老城区高踞于江面的水运大码头。若是它被“夷为平地”，那江水岂不是就淹没山城了吗？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场面。

（王力“八七讲话”）“王力的一番话迅即为红卫兵接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打开了绿灯。”（232页）

从来没有发生过“红卫兵接管外交事务”的情况。红卫兵是学生组织，在外交部夺权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大多是工作能力很强、政治条件很好的外事干部）。而且所谓外交部的“夺权”，也只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对外交业务实行“监督”。

“四川著名的造反派夫妻刘结挺、张西挺在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把‘八大’产生的西南局强有力的领导人李井泉拉下了马”。（297页）

这句话有几个问题：1.说刘、张是“造反派夫妻”，说法不准确，因他们既不属于群众中的造反派，也没有像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潘复生那样参加造反并领导当地的夺权，而是在文革前的官场倾轧中受到打击、文革中到北京上访申诉，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平反，被中央认定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文件，1967年4月4日），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对于领导干部中的这类文革中得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站在造反派一边与“走资派”斗争的人应该怎样称呼，值得研究。

2.“在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显然说的只是1966年的冬天。这样的表述显得有些别扭（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3.“‘八大’产生的西南局……”中共“八大”是在1956年召开的，当时并未“产生西南局”，重新设立大区中央局是在“八大”闭幕几年后，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作出成立中央局的决定，1961年1月18日经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

4.“把李井泉拉下了马”，这有点像文革中造反派歌颂刘、张的语言。刘、张能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拉下马吗？红卫兵、造反派也没有这个本事。把李井泉拉下马的只能是毛泽东（以后也同样是毛泽东重新把李井泉又“扶上了马”而且不对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作任何说明），刘、张不过是被毛泽东临时利用的棋子而已。

“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337页）

此说不确。林立果从未“执掌空军大权”。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曾对林立果说过，“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但是，吴法宪后来在回忆中说：“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771页）

□ 原载《记忆》第61期2010年10月30日

~~~~~

## 【史林一页】

### 陆平为什么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

• 钱 江 •

“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浩劫，发动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批准的“五一六通知”，另一个就是在“通知”鼓动下，经康生、曹轶欧策动而产生，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署名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点名批判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批判他们压制北大的“文革”，宣布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挑动师生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这张大字报随即得到毛泽东称赞，并以“我的一张大字报”与之呼应，矛头直指刘少奇。至此，“文革”的妖魔跳出了潘多拉盒子，怎么也压不回去了。

“文革”后期的1975年7月，陆平在北大被解放，随即调任七机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2003年在北京逝世。近年来，关于他在“文革”中的史料逐渐被披露。

#### ◇ 从北大学生到青年政治工作者

陆平原名刘志贤，1914年11月15日生于吉林长春，1931年1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33年2月，还是中学生的他加入共青团，一个月后转为中共党员，当年5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是北大活跃的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投身抗日救亡，先后来到济南和太原，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组织部长。1938年12月到1940年10月，担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6月到1943年3月，担任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1945年后任平北地委副书记、书记。总之，“围着北平打仗”，是陆平抗战时期的特点。

抗战胜利后，陆平转入军队，先是在地方部队冀察军区政治部当主任，后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主任。随着战争规模扩大，陆平于1947年12月调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他的直接领导政委胡耀邦，与他一起在华北（主要是河北）战场上纵横驰骋。1948年12月，陆平调任华北局青委书记，胡耀邦则继续在军队工作。没有想到，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都作为青年团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并共同合影留念。陆平专事青年团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6月，调往东北担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但他一直兼任青年团中央委员。1954年11月，陆平调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57年“反右风暴”，主事者不满意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将他调离，打算向北大另派老资格的干部。陆平于1957年10月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校长暂时还是马寅初）。1960年，陆平担任北大校长。

#### ◇ 成为矛盾的聚焦点

陆平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回到母校北大，担任母校的第一把手，从此便踏入了是非之地，争议之声伴随他的后半生。陆平是在“反右”高潮中来到北大的，北大正经历自身发展中一次深深的创伤。他到校才两天，校务委员会讨论反右部署，江隆基报告说，截至目前，北大教职员中划了90个右派，在学生中划了421人，总计511人。这是一个相当高比例的“划右”数字。陆平接受工作后，主持“整风补课”，结果到1958年1月31日，使北大的“右派”

达到了699人。也就是说，188人的“划右”和陆平有关系。事后有一种说法：此种“错误应由集体负责”。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应该明确的。

当时北大各系各单位上报的“划右”人数远远大于此数，在最后决定时是压缩的。后来陆平在回忆文稿中写道：“当时我的思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右派分子之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如物理系、数学系有的班级右派分子占据多数，怎么能办下去？……对于反右派斗争有什么错误，我的头脑是不清醒的。”说明到这个时候陆平已经考虑“可划可不划”问题，并在实际定案时压缩“划右”人数，问题在于，离开了法律准绳的时候，划与不划，将青年学生推入灾难还是给予保护，必然产生很大的分歧。按照几条粗糙的“标准”，肯定量不准是非曲直，还会造成矛盾和积怨。后来，陆平反思道：“（反右）整改运动，从表面上看还是热烈的，但实际上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是严重的。党内的民主大为削弱，人们不敢提不同意见，不说真心话，不写文章，‘双百’方针搁置了。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恶果，危害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平一来到北大，就被置身于矛盾中心。此后，随着指导方针越来越左，挨整挨批者接踵于道，陆平那些合理或正确的做法也被视为是“右”的，矛盾逐渐积累，到1964年“社教运动”开展起来，终于危及陆平自身，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 ◇ 社教工作队进北大激化矛盾

1964年上半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在农村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运动”）。运动发现，到处都存在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修正主义”倾向严重的问题。于是，社教运动又向城市延伸。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调查组进驻北大。结果很快发现，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很猖狂”，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当时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向工作组进言，说北大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中央精神不能得到贯彻。她的报告加深了工作组对北大负责人陆平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了决策领导，使北大领导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北大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宣部十分重视，遂于1964年11月组成庞大工作队，仍由张磐石负责，进驻北大抓社教运动。工作队为了证明自己前次报告的正确，即于月底形成“二号报告”，更尖锐地提出，北大党委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向”。这就一下子将陆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陆平本来和张磐石是熟悉的，1948年以刘少奇为第一书记的华北局成立时，陆平是青委书记，张磐石是宣传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一进北大，陆平就去看他，问他“要不要汇报”等等。张说不要，也不需要北大党委的配合。看来，工作组进北大就是要抓出阶级斗争“成绩”的，陆平在劫难逃。很快，工作组已经对校党委产生负面印象的传闻使得陆平紧张起来，他即到北京市委向刘仁汇报。北京市委不满意工作队在北大的活动，陆平对工作队的种种做法也产生了抵制。但是，自批判《红楼梦研究》和反“胡风集团”运动以来，北大校园中运动不断，被整过的人重重叠叠，积怨已深。由于指导方针的影响，左了还要接着左，你左我更左的情况比比皆是，加上民主生活的缺失造成“小报告”盛行，工作队容易得到负面材料和报告，再以更左的方式解读，将北大的社教运动指导方针确定为：“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五项任务。”这样，要想不搞偏见和无偏差就很难了。

北大实行双重领导制，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关系密切，北京市委不满意中宣部工作队的意见，认为陆平最多是“好人犯了某些错误”，工作队主要领导则认为北京市委包庇陆平。张磐石和陆平，两位在战争年代曾工作在一起的战友，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牌子下分道扬镳，而陆平和以彭真为书记的北京市委的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

## ◇ “五一六通知”引出“大字报”

1965年1月23—24日，陆平、彭佩云参加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中的高校小组会，他们分别做了自我批评，也对北大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工作队负责人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大社教惊动了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于3月3日主持会议，着重讨论北大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北大社教取得的成绩，又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认为，不能把北大党委当作“烂掉的单位”来看待。工作队内部，也有人不同意将北大党委推向敌人一边的看法，尤其是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他随后上书总书记邓小平，指出工作队搞社教的做法是有错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3月5日宣布将北大社教5人领导小组扩大为8人，增加了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佩云。这样，原工作队的势头就低落了。中宣部在4月初组织工作队部分人员会议，范围逐步扩大，至月底宣布撤销张磐石的工作队长职务，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取代，并增加常溪萍为工作队领导小组成员。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彭真在北大社教的前一轮起伏中控制了局面，支持了陆平。但是，随着“文革”大劫难的到来，也由此为与工作队斗法暂时处于上风的陆平成为“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埋下了伏笔。

随后，陆平松下一口气回北大了。但是，社教运动几乎使各个系都出现了两派对立，相互指责对方“不革命”而自己是“真革命”。为了调和矛盾，中宣部、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共同组织，于7月底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议。彭真对此事非常关心，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增加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副组长，陆平也是小组成员。会议一直开到了9月开学之时，大部分系的对立双方停息了争吵，因为开学也就返校了。但是以聂元梓为总支书记的哲学系积案甚多，分歧尖锐，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以聂元梓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党委书记陆平的压制。1966年1月，会议主持者觉得再僵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宣布哲学系的整风会也到此为止。但是，聂元梓等人认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他们是被压制的一方，于是耿耿于怀，等待时机翻案。

1966年春天，对北大来说相对平稳，校党委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聂元梓也被派到怀柔搞农村社教。她没有出发就生了病，干脆在家休养，颇有“蛰伏”的样子。陆平又能抽身出来，对一直关心着的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继续给予支持。但就在这个春天，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最后导致5月由陈伯达等人重新拟定了关于“文革”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由此正式发动起来了。

聂元梓作为校党委成员听了“五一六通知”，如同“晴天霹雳”。她立即想到自己被陆平“发落到乡下”就是挨整，而陆平的后台就是北京市委领导人。好几个晚上，聂元梓没有睡着，翻来覆去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她由此判断，彭真支持陆平肯定是错的。聂元梓决心自己跳出来呼应“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纠集了在国际饭店会议前后给陆平提过意见的若干人，又经康生、曹轶欧策动，于5月23日晚上商议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拿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传达的开展“文革”的讲话开刀，主要部分则是批判陆平和彭佩云。这份大字报于5月25日完成，即张贴在学校大饭厅的东墙上。

5月25日当晚，北大校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问题。讨论中，党委成员对大字报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大部分人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要动员聂元梓本人，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的室内地点。另一种意见，虽然只有2个人，但显得很强硬，他们主张予以支持，而且说，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校党委应该表态。他们首先要求陆平表态。陆平说，把他和宋硕说成黑帮，不能同意。

在聂元梓等 7 人大字报的背后，策动者康生、曹轶欧夫妇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后，是康生以“绝密件”方式将大字报稿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 月 1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于当天向全国广播。此举非同小可。看到 6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的大字报，陆平马上想到，要有一个挨批 5 年的思想准备。他没有想到，在“文革”中挨批的时间恰好是 5 年的一倍——10 年。陆平由此成为“文革”肇始首位倒下的大学校长，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

□ 原载《湘潮》2010 年 11 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